

第一部分

中国传统

第一章 传 统

一、人的活动

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自身活动的创造物。

人在世界的生存，就是凭借自身器官与构造的生命活动和创造。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人就是人的活动”。活动就是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生命的全部。

人的活动，包括单纯的动物性生命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自觉、自主的活动。严格地说，自觉、自主的活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活动。

人自觉自主的活动，首先面对的是自然界。因此，人的活动首先是改变自然界的活动。当然，由于人同时生存在自己创造的社会之中，改变现存物质世界的活动包括改变社会的活动。实践，作为哲学范畴，即人自觉自主地改变现存物质世界的活动，包括改变自然和社会的两部分。

人自觉自主地改变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实践，内在包含着人的精神活动。从总体上说，精神活动无法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只能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如果不讨论动物是否有精神的

问题，那么精神是人实践特有的同时又是从属的、不可缺少的性质。精神伴随着人的活动形成、丰富、发展。离开人，谈不上精神；没有精神，人也不成其为人。在实践过程中，人的精神由贫乏到丰富，由粗陋到精微，演变为极其复杂的主观精神世界。

人的精神世界，大致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思维、情感体验、意志导向。

第一，理性思维是人在感性经验基础上形成抽象概念、判断进行推理的思想过程。即，使用范畴与命题合逻辑地思考以确定事物的相互作用、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现实与可能关系的过程。科学知识、理论是人的理性思维最典型和高级的形式。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理性思维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第二，情感体验是人对自身遭遇做出的情绪性反映。情感体验包括思想的因素，但是不能归结为理性思维；包括意志导向的因素，但是不能归结为意志导向。人的浅层次情绪，如喜、怒、哀、乐、厌烦与焦虑；人的高层次情绪，如忧患、高尚与悲壮，都属于情感体验的范围。

第三，意志导向是人选择的行为目标与实现目标的精神坚定程度。目的性是人的自觉、自主活动的内在成分，是人作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动机、目的、理想是人的活动的内在灵魂。意志坚定性是人精神世界的成分之一。有些人为了理想一往无前，有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不前。

人自觉、自主改变物质世界的活动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归根结底，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具有社会性。同时，人的活动总是一定历史时代的活动。不存在脱离社会、时代的纯粹个人的孤立活动。任何个人和群体的活动都具有那个社会和时代的特征，包括创造性和局限

性。任何个人和群体的活动、行为也只有放在那个社会和时代的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和认识。

归结以上所述，人的活动，从本质上说是自觉、自主的改变物质世界的活动，具有客观对象性、精神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征。

如果把人的活动进行简单分类，那么人的活动大致包括：物质生产活动、社会交往活动、日常生活活动、科学创造活动、艺术创造活动、政治活动等类型。如前所述，这些活动中无例外地都包含着精神活动的成分，精神活动是这些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在因素。

第一，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是满足人日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基本手段。归根结底，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需要得以满足和丰富、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第二，社会交往活动。人的存在不可能是单个人的存在，只能是群体的存在。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是人成为人的必要条件。社会交往活动创造并形成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和社会关系使个人成为特定的社会角色。总之，社会交往活动是人的另一类基本活动。

第三，科学创造活动。科学创造活动是探索世界的有目的的实验活动和理论创造活动的总和。科学实验活动是从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分离、独立出来的活动。科学实验活动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改变认识对象，并从中获取感性认识和经验。人在感性认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理论创造活动。即，使用归纳和演绎的基本逻辑方法，在分析和综合感性认识、经验的过程中，形成理论范畴（基本概念）和科学原理（公理、定理），建构理论体系。当然，科学理论还要在后续的科学实验和社会生活

中受到检验。总之，科学创造活动是科学实验活动、理论创造活动的交叉相互作用过程。

第四，艺术创造活动。艺术创造活动是人自觉地感受、体验世界和再现或表现世界的情感性活动。强烈的情绪体验：喜、怒、哀、乐、爱、恨，是一切艺术创造活动的原动力。使用感性直观的手段、形式再现或表现此种情绪体验是艺术创造活动的主要内容。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是艺术创造活动的现实源泉。艺术创造活动中包含着理性思维和意志导向的成分，但是不能归结为纯粹的理性思维和意志导向活动。

第五，日常生活活动。日常生活活动是一种综合性活动。人的生命活动走人既定的轨道，成为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习惯，即日常生活活动。因此，日常生活活动既是自觉、自主的活动，又表现出较大的惰性、惯性，近乎成为无意识的活动。日常生活活动集生产活动、交往活动、思维活动、情感活动、意志活动于一身，表现为较稳定的个人、群体的存在方式。

归结以上所述，人的活动、自觉自主的改变世界的活动是人成其为人的根本所在，是个人与其他个人相互区别的基础，是理解、认识人的关键。

二、社会活动方式

活动不仅是理解人的关键，同时也是观察、把握社会的出发点。

在社会中，个人的活动通常表现为习惯性的活动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活动（行为）方式构成特殊社会的基础和背景。把握住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活动方式，就抓住了认识此社会的钥匙；同样，把握住一个时代的具有普遍意

义的个人活动方式，也就掌握了理解此时代的钥匙。

活动方式是对人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的哲学概括，是千百万人的活动的共性和相对稳定性。

与人活动的多种类别相对应，活动方式大致分为：物质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科学与艺术的创造方式、理性思维方式、情感体验方式、意志导向方式、政治活动方式，等等。不同的历史时代、国家、民族具有各异的活动方式。正是这种互异的一般个人活动方式构成了伟大人物历史创造活动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舞台。

第一，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产方式是人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方式，大致包括进入生产过程的人运用物的方式、以及进入生产过程的人与人交往的方式两个部分。例如：劳动者、管理者、所有者和工具、厂房、原材料等自然与社会资源；人对物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强迫、自愿、从属、服从、雇佣、指挥、协商、合作的关系。从逻辑上说，物质生产方式是基本的社会活动方式，直接决定着物质财富的丰富程度、人民物质生活的水准；决定和影响社会的政治状况与精神面貌。

第二，社会交往方式。社会交往方式是在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方式。人通过交往活动建立起（血缘的、地缘的、团体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反过来制约并规定个人成为特定的活动主体、社会角色，社会关系与交往方式是决定社会角色、社会主体本质的因素。社会交往方式包括冲突、协作的两方面，或者是冲突的成分占主导地位、或者是协作的成分更多，但是绝对冲突、绝对协作的情况比较少见。

第三，理性思维方式、情感体验方式、意志导向方式共同构

成人的精神活动方式。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即习惯并固定了的思路。当人的思想简单地循着习惯路径进行时，思维通常不具有创造性。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模式，即面对外部刺激采取的大致相同的情感感受和表达方式。确定的动机与追求，即通常所说的价值取向——被人认为是有意义和值得去努力奋斗争取的事物，它们构成了人生的意义和目标。相对稳定的思维套路、积极或消极的情感体验习惯、较为固定的动机与追求渗透在人的行为之中，支配着人的对象性活动。准确把握人的精神活动方式的细微差别，是区分时代、社会、个人的重要方面。

第四，科学和艺术的创造活动方式。精神活动方式是科学和艺术创造活动方式的本质成分。但是，科学和艺术的创造活动方式不能简单、全部归结为纯粹的精神活动方式。因为，科学与艺术创造活动是一类特殊的社会活动，科学、艺术的创造活动方式是人类的特殊活动方式，给予一般社会成员以直接、广泛、多方面的影响，引导着社会发展。

第五，日常生活活动方式。对于多数人来说，按照既定的轨道日复一日地生活或工作是正常的生活状态。日常生活方式是既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精神活动方式的集合。日常生活方式构成社会的普遍生存状态。

第六，政治活动方式。政治活动方式是人处理、解决社会集团利益关系的特殊交往方式。政治活动是从社会交往活动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处理群体利益的特殊活动。政治家、政党即以政治活动为专门职业或领域的个人、组织。不同社会、时代应用各异而又相对稳定的政治活动方式处理、解决集团间的利益关系，构成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历史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政治活动方式法律化构成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

归纳以上所述，正是相对稳定的活动方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

物质财富、基本一致的思想 and 情感、各具特色的社会制度，形成了各民族、地区的特殊性。

观察世界各民族、地区的历史，差别是一目了然的。例如：中国的农具和陶器、游牧民族的弓箭和马具、阿拉伯手工业者的专用工具；中国的长城和故宫、罗马人的城市和水道、欧洲的教堂和皇家建筑；中国的菜肴饮食、穆斯林的牛羊肉制品、欧洲的啤酒和面包。再如：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和亲属关系、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度、东方的专制政治制度、欧洲近代的手工工场制度；古代佛教视人生为苦难、追求出世，古希腊重理性思维、充满理论兴趣，古代犹太人面对宇宙自觉渺小、诚惶诚恐，等等。不一而足。

相对稳定的活动方式与其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社会制度、精神世界，对于不同的地区、民族是各异的，具有鲜明的差别。但是，对于同一地区、民族则构成了历史继承性、社会连续性的基本内容。

相对稳定的活动方式与其创造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物质财富、社会制度、精神世界即传统（Tradition）。传统是历史的继承性和社会的连续性的集中体现，传统的更新则是社会变异和间断性的主要标志。人类社会作为继承性和变异性、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传统就是继承与变异、连续与间断的内在根据，借用生物学的术语就是社会的遗传物质——“社会基因”。

三、现实中的历史因素

从社会基因的角度看，民族传统、广义文化是近乎等同的概念。

哲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关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犹

太文化，古代文化、现代文化，东西方文化差别、中西文化冲突的种种讨论，实质上就是对历史传统的研究。

对历史传统、广一义文化的构成做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三个基本层面：物质、制度与精神。这三个层面的核心是价值观。最终，历史传统体现为特定的活动方式与生活方式。因此，某个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可以归结为对此民族的传统、广义文化、生活方式的感性描述和理性再现。

首先，就物质层面而言。物质给人的印象最直观、具体、生动。考古发掘的古代遗址、墓葬、工具武器、饰品衣物，保留至今的皇宫、四合院、驿道、运河、教堂、金字塔，古代艺术家留给后人的雕塑、绘画、工艺品，乃至今天人们仍在使用的镰、刀、斧、锯、针等工具，都属于物质层面。

其次，就制度层面而言。制度不可能像器物一样抓在手中直接观察。这并不是说制度是不真实的。恰恰相反，制度是时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的人类，血缘关系是基本甚至是全部的社会关系，血缘群体就是社会本身。因此，血缘关系和血缘群体就是未来一切制度的源泉和萌芽，从血缘关系中分化发展出今天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复杂制度体系。古代中国人建立了等级层次分明的宗法家族制度、皇权专制制度，古代希腊人建立了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度，近代欧洲人则建立了规范的企业股份制度。

最后，就精神层面而言。精神似乎是虚无缥缈的，因为，精神最终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人无法直接看到精神本身。但是，精神仍可以被人把握。可以透过人的外在活动把握人的精神，更可以通过阅读记录着精神的书籍去理解和把握精神。不同时代、民族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古代世界各民族在上帝、安拉、神、佛、圣人的旗帜下相互征战讨伐。现代世界则借着正义、人权、

民主、“国家社会主义”、“优等民族”之类的名义进行频繁商业交往、空前残酷的战争和无数秘密的政治交易。一切人都按照自己精神的引导从事交往和行动。

由三个层面建构起来的传统的核心是价值观。一旦价值观定型就会支配个人、群体、民族的行动，引导人沿着特定轨道、向着既定目标前进。

无论哪种形式的价值观都以选择作为结果。人们可以选择自然、道德、神、理想人格、理想社会，投身科学、艺术、世俗生活，追求金钱、感官快乐，满足占有欲、统治欲等等。

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人生态度：或者积极、或者消极，或者悲观、或者乐观，或者出世、或者入世、或者厌世，等等。根据不同的选择，人走上多样的生活道路：有人由于入世而在红尘中沉浮，由于出世而入寺为僧；有人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满足和快乐，有人在科学道路上感受成功与失败，有人在政治风云中体验人生五味，也有人在辛苦的体力劳作中终其一生。

个人、民族的生活道路因此而分道扬镳，五光十色，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所谓传统，正是历史形成的、以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包括物质、制度、精神多层面的特色人生。传统是历史的，但是传统又是现实的，是仍然活着的历史。传统的意义就在于作为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仍然活在后人的现实世界中。

认识历史传统，有助于把握现实；反之，透过现实，可以发现历史传统。传统是连接现实与历史的桥梁，传统就是活在今天的过去。

当然，现实与历史是不会完全相同的。传统作为现实中的历史因素，是以或多或少变化了的形式存在和出现的。例如，某种民族建筑风格会保留相当长的时期，而建筑材料、技术则不断改

变；民主政体源于古代希腊，但是比起古希腊却不知复杂了多少倍；在今天的中国不难找到古代的家族崇拜、道德教化、国家至上的成分，但是今天中国与古代大不相同；今天的欧洲人仍然去教堂祈祷，但是他们的宗教态度却与中世纪相去甚远。总之，传统很容易在现实中找到；但是，现实中的传统只是久远过去的影子或痕迹，并不就是旧时代的完全重现。

四、正统与异端

人不可能脱离传统。因为，传统是一种规定，是社会加在人身上的限制。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归根结底是有限的存在物，必定以某些规定性为自己的限度。人，除去动物的肉体规定性，剩下的就只有社会给予自身的限制——历史传统、广义文化、生活方式。如果有谁认为，自己能够脱离传统的限制而存在，那就无异于宣布：他已经超越了有限，不再是人；而是无限、是神、是上帝。

人总是活在一定的传统中，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但这决不是说，传统是永恒不变的。更不是说，人不能改变传统。

两千年前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这个道理对一切事物都适用，传统也不例外。人们受到概念确定性的束缚，常常忘记：概念自身是不变的，而用概念表示、指称的事物则每时每刻处在变化之中。即，人常常忘记自己是在使用不变的概念去描写不断变化的客观事物。传统就是每时每刻变化的社会事物，而不仅仅是纸面上的不变的人工概念。

传统是人创造的，同时也是人改变的。由个人原因、社会原因、自然原因所引起的人类活动的变化时刻都在发生。从人的活

动形式的变化、到活动内容的变化，也就是传统的改变。旧传统会消失，新传统会生成；即使传统继续存在，也会出现、发生细微的变化。时代越久远，旧传统的影响可能就越淡、变化就越大，后起传统的作用就越显著。总之，传统处在不断变化中。

引起传统变化的原因有两个：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来自外部的原因包括两类：自然的变化、其他社会的作用。

首先，自然因素的变化会改变传统。这在原始人类的身上表现得最明显。洪水泛滥、长期干旱、传染病流行，都可能使氏族、部落灭绝，使一种传统消失。即使不是完全毁灭，也会使其发生重大改变。其次，外部社会的作用会改变传统。当被隔绝的社会由于商业、技术、思想、军事、人员的交往而相互接触时，传统的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古代丝绸之路把东方的丝绸、纸张输往中亚、欧洲，把异域的良马、葡萄、胡萝卜、苜蓿带给中原，促使双方变化。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传到欧洲，成为欧洲封建社会解体的因素之一。而游牧民族的南迁则在多方面影响中原地区。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传播分别造成广大地理空间的精神统一，使无数地方传统不复存在。罗马人和哥特人的战争造就了崭新的封建传统。透过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国人逐步看清从物质到制度、到精神都不同的一种新文化正在袭来，意识到自身传统的非神圣性，逐步地实现着传统的转变。

来自本社会内部的变化是另一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社会总是在变的，如：生活习惯的差异、职业和技术的分化、需求的多样化、个人兴趣和才能的多种发展，以及地区、城乡、血亲、民族、行业、阶层之间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方面的分歧。这些社会内部的分化、分歧、冲突是社会传统变化的内在根据。特别是那些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大国、或者是那些影响广泛的文化类

型，一方面内部具有统一的悠久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大量的内部差异。这类国家和地区，历史悠久，传统的演变漫长而复杂，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看看中国、印度、欧洲的历史自然就会明白这一点。

传统的变化，或者是无意识的自发过程，或者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过程；传统变化的方式或者是较为平和的，或者是经过严重冲突的结果。

第一，传统的无意识的自发改变。在社会的正常发展时期，社会的自然而然的自发变化，往往是通过缓慢的平和的变化方式来实现的。人们在周而复始的生活轨道中平静的生活，常常意识不到自身与社会的变化。

第二，传统的自觉、但较为平和的发展。社会往往会遇到某些外部和内部的重大变化。人们感觉到重大的变化就在眼前，尽管感到恐惧和不安，但是人们意识到变化的必然性，因此传统的改变没有遇到有意识的系统抵抗。传统通过较为平和的非对抗的形式逐渐完成改变。例如，连续的干旱和洪水、某种严重疾病的流行等自然界的改变对人的生活与生产的影响。或者，由于两种社会力量的严重不平衡，一种传统悄无声息地自然消失，别种习惯则顺利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在这两种情况下，传统的变化被人自觉接受，但没有遇到系统的有组织的严重抵抗，而是通过较为平和的方式实现。

第三，传统的自觉，通过剧烈冲突的变化。传统的自觉变化，充分体现了人的创造性。人可以由于对现实的满足，也可以由于对既有事物的神圣感，如：对祖先和权威的敬重、对家庭和宗教的感情、对故土的怀念等而维护传统，站在正统的立场做传统的捍卫者、卫道士。当然，人也可以因为对现实的不满，为追求新生活，如：自由、正义、温饱富足、活的权利而否定传统，

站在异端的立场做传统的叛逆者。无论是作为传统的捍卫者、还是作为传统的叛逆者，人总是可以找出理由为自己辩护，使自己的立场和行为看起来显得更神圣。此时，传统的改变常常要经过严重的对立、斗争，甚至是战争的洗礼才能实现。

视传统为神圣、正统的人，仅凭着自己对旧习惯的留恋，或者是因为旧情境的方便，或者是找不到旧传统的更好替代物，而成为传统的捍卫者。为了保卫传统，他可以把现存事物理想化，现存时代神圣化，甚至把千疮百孔的现实视做完美无缺；他可以把一切对传统不满的人都视为异端、敌人，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力量去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传统的拥护者有充足的根据认为自己是合理的。

对传统不满的人，或者因为不堪忍受现实的重负（物质贫困、生存威胁、社会关系束缚、婚姻不自主、情感挫折、意志不自由等），或者因为发现了与传统不同的别样生活方式，而成为离经叛道者。为了否定传统，他会借用别样生活方式说明现实生活的不合理性，会改写甚至伪造历史以证明古老传统的非现实性，会创造一个理想未来反衬现实的卑鄙和丑恶。传统的叛逆者有十足的理由认为自己是未来、正义的化身。

正统与异端、卫道与叛逆，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人类社会中永恒的两种力量。传统在这两种力量的消长中延续和变化。个人的幸福与痛苦、成功与失败、伟大与渺小，家族的荣华富贵与烟消云散、阶层的上升与下降，民族的兴盛与衰亡、帝国的扩张与分裂，也都在这两种力量的变化中实现。

在 19 世纪的欧洲，青年马克思以叛逆者的身份起来抗议资本主义的弊端：资产者的野蛮暴富和为所欲为，劳动者的颠沛流离和无依无靠；而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则视马克思主义为异端邪说，通过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捍卫自身的合理性，通过镇压工

人运动来寻求自我发展。20世纪初的中国，少数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痛感古代中国传统的无能、无用，痛感大多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可悲，挺身而出、起而抗争；而久已习惯了旧生活方式、丧失了新鲜感的多数人，要么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要么以传统为命根子、视西方思想为洪水猛兽、视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新派人物为无父无君的禽兽，坚决做传统的卫道士和殉葬者。19世纪、20世纪两百年的时间里，正统与异端、卫道与叛逆，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较量，构成了时代历史的主线和基本内容。

正统与异端的对立，是人的高度自觉的行为，即为理想和信仰而进行的生死斗争。

五、信仰的建构、兴盛与衰落

自古希腊的欧洲文化有一个重要的传统：理性主义传统。按照理性主义传统，纯粹的感性认识没有真理与非真理的区别可言。真理只存在于以概念、判断、推理为形式建构起来的人类思维之中。闪烁着思维光辉的科学理论在当今时代作为人类理性的集中体现，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被多数人顶礼膜拜。

传统的捍卫者、叛逆者，几乎无例外地借助理性思维的力量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理想、信仰是理性思维的结果，也是不同社会集团维护的“真理”、“正义”的化身。

传统的捍卫者不断地对其理想、信仰加以修补和完善，使其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在现实中成功应用，最终使其超凡脱俗、神圣化。古代欧洲在罗马帝国的土壤中诞生了基督教。基督教历经千余年的雕琢从粗陋走向精致达到顶峰，形成了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体系。古代中国的孔子，生前摇唇鼓舌、四处碰壁。在其

身后的两千余年中，经过无数帝王、政治家、思想家的补充、丰富、提倡、推行，摇身一变成为历代顶礼膜拜的圣人。总之，欧洲的基督教、中国的孔孟儒学，都经过了长期精炼，最终成为各自传统的核心，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信仰

传统的叛逆者与捍卫者不同，没有现成完整的理想和信仰可资利用。他们需要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思想材料中寻找可利用的成分，组合、创造新的思想体系。即，叛逆者首先要创造理想和信仰的体系，然后才能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战。对于叛逆者的思想家来说，信仰体系的创造过程极其艰难。因为，旧传统的迫害、阻挠如此严重，自己手中又几乎没有其它物质手段和社会制度可资利用。一切后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基督教、孔孟儒学就是最好的例子。

概括地说，理性思维倾向于构建一种理想和信仰的体系，并使其尽可能完善，以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和说服力。

从过程的角度看，理想和信仰的建构，总是从某些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以便从中获得所需的普遍概念、共同话语、思维框架。当然，主体也会从自己的经验中提炼形成新的范畴和命题，丰富已有的思想观念。这些普遍概念、共同话语、思维框架，可以称为理论思维因子，即理想和信仰借以开始建构的原始材料。

理论思维因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思维因子的相互作用中包含两种倾向：第一，相互制约，竞长争高；第二，相互促进，配合协调。相互作用及其竞争、合作的两种倾向，导致理论思维因子偏离初始状态（其中一些因子不断丰富成长，另一些因子则被抑制衰落），进入理想和信仰的自组织过程，即随机涨落过程。随机涨落意味着信仰建构初期理论思维因子相互关系的不稳定性。各种理论思维因子自发地尝试建立一个稳定结构，各种可能

的结构接踵而至。此阶段，理论思维的运动呈现出多种可能性，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试错过程。

应当说明，理论思维的偶然涨落过程，受制于某些外部因素，主要是主体活动方式、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的制约。这些因素作为确定性制约参量，在随机涨落过程（即，可能结构的遍历过程）中做出选择，使其中一种结构逐渐突现出来成为稳定结构。

此种理想和信仰的稳定结构，有别于原始的理论思维因子群，是未来思维借以生长的胚胎与萌芽。在上述各种确定性制约参量的干预下，这种稳定结构不断自我修补、完善、放大，最终成长为定型化的理想和信仰体系。

理想和信仰体系一旦形成，通常会进入一个兴盛期。其中若干基本概念会深入人心，演变为流行的、甚至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先验观念。其中一些命题不受怀疑与批判地成为思想的根据，甚至泛滥为妇孺皆知的格言警句。而其中某些推理论证过程则定型化为思维方式，渗透在主体的实践与精神中，以至时过境迁，人们仍然无法摆脱其束缚而成为旧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卫道士或殉葬品。

理想、信仰体系的兴盛得到了双重根据的支持。第一，精神领域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共同支持。就理性而言，人们相信此理论体系是由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合乎逻辑地推论的结果，是被证明了的可靠知识。就非理性而言，情感、信念的因素常常比理性给予人更坚定的支持。这两方面的结合往往使人坚信此理论体系的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性。第二，由此理论体系推论出的解释性、预见性结论与主体行动结果的一致，即实践的支持。人们常常忘记，实践对理论、信仰的支持的有限性，把实践对信仰的支持绝对化，不加怀疑地相信理论、信仰的“无限”真理性。基

于上述精神与实践（证明与证实）的双重根据，理想、信仰在一段时间内的兴盛是必然的现象。

理想、信仰像大海的浪潮一样，有涨潮就有落潮。当主体实践最终超越旧的领域和水平，主体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以往关心的中心话题随之改变甚至不复存在的时候，曾经兴盛的理论信仰体系自然就会衰落。首先，人们发现，按照此理想和信仰体系推出的结论与实践的结果出现分歧，并且分歧的频率越来越高。经验事实对理论体系的否定，使人对其有效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其次，在实践造成的怀疑气氛中，喜欢寻根究底的少数人逐渐意识到，曾经被认为是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进行的清晰明白的证明过程，其实是有疑问的。或者不证自明的公理并不是真正的“公理”；或者推论过程并非“清晰明白”，某些中间环节被忽略并被简化。在怀疑气氛渐浓、不断发现缺陷的过程中，旧的理想和信仰体系开始解体，新思想纷纷萌生登场，形成了新时代的多种理论思维因子，并在社会制约参量的干预下开始了新一轮理论建构过程。

运用上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能够较好地解释古代儒家思想形成、独占统治地位直到近现代衰落的过程。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史载周公创封建以为政治制度、定宗法以为伦理制度、划井田以为经济制度，并使三者相互补充。孔子念念不忘周公之礼，主要依据个体家庭农业生产方式和宗族血缘交往方式提炼、创造了自己的核心范畴“仁”。仁的基本内容在于“孝悌”，即家庭内部一种特殊的稳定而又规范的父子、兄弟关系。

当时，孔子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诸子百家各有思想：道家重无为，主张不治之治，崇尚个人的自由与全生；法家主张经世济民，以法治国，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墨家反对仁政礼治，主张